

教育、国民素质与社会冲突

梁 枫

[摘要] 长期以来,针对教育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的功能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在微观层面上,主要关注教育对个体“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回报。实际上,教育对经济和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从微观层面探究教育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教育影响社会冲突的中介效应研究不应只聚焦经济因素,还应关注国民素质等非经济因素,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解释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的产生原因。基于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教育可以降低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同时,研究还发现,国民素质是教育影响社会冲突的中介变量之一。这说明教育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上述研究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两点:其一,政府在制定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时,不应只考虑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性与工具性,而应更多地关注深层次的影响我国社会秩序的问题,如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民素质的问题。与之对应,政府在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的工作中,应该更多地发挥教育所具有的提升国民素质的功能,即通过发展教育使社会维持稳定。其二,提升国民素质应成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不仅要让国民具有强健的体格,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更要让国民拥有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规范意识等,在提升国民素质的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

[关键词] 教育; 国民素质; 社会冲突; 群体性事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观察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也多以经济因素作为中介,如在宏观上,

[收稿日期] 2018-11-09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群体行为涌现机理及风险辨识研究”(11&ZD174)。

[作者简介] 梁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地址:liangfeng@sjtu.edu.cn。

教育能够通过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微观上,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升个人幸福感等。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保持了快速发展,个人受教育程度,特别是高等教育大幅提高,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社会体系的稳定程度理应随之显著提升。然而直观感受上并非如此,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现象时有发生。李林和田禾(2014)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发生的并被境内正式出版发行的纸质媒体,以及拥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网络媒体报道的群体性事件共3145起,其中有36起群体性事件造成总计至少79人丧生。

在影响社会冲突的因素里,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其他因素,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多遵循“外部环境→主观判断→行为”的演化过程,经济因素更多代表着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客观因素,参与者在这些外部环境中形成主观判断,然后决定是否参与。因此,教育对社会冲突影响研究中介因素的选取,不应只聚焦经济因素,一些同样与教育有着密切相关的并会对参与者主观判断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也应得到关注,这样才能全面解释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冲突。综上,本文选取国民素质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对教育、国民素质与社会冲突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争取在教育收益及社会冲突研究领域有所创新。

本文第二部分基于文献回顾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模型、变量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讨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讨论本文的政策含义与研究局限。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在我国,教育对社会冲突的影响效果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冲突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例如赵鼎新(2011)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激发维权意识;金桥(2012)发现教育程度的提升会明显促进民众的制度外政治参与。但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例如李汉林等(2010)发现受访者的教育程度越低,其失范的感受、不满意度的感受、相对剥夺的感受及地位不一致的感受越强烈;另外,上海市教委的一份项目结题报告^①曾指出,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个体,更愿意遵守法律和制度。文献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了引言部分的论断,只将经济因素作为中介变

^① 具体可参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结题报告(2010)》中的《文化资本视角下的阶层地位获得与阶层意识研究》一文。

量,并不能完整地解释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冲突。

基于已有文献对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的回顾,可以发现在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多(郭星华,2009),并且这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泄愤式的参与,极易使群体性事件升级成为群体性暴力事件(于建嵘,2015)。典型案例包括闹事群众袭击武警的石首事件,以及闲杂人员围攻政府的瓮安事件等。Dahrendorf的现代社会冲突理论指出社会冲突的基础是利益冲突,产生于权利分配不均衡(拉尔夫·达伦多夫,2016)。王战军(2006)认为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多由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而引起,民众参与的逻辑前提是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利益剥夺。然而,帕森斯认为要维持社会秩序,需要将共同价值观输入社会成员的意识当中,形成普遍的自觉(Parsons,1961)。教育是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本途径之一,教育向社会成员提供行为规范、认识框架等,通过学校等机构培育社会成员的人格和能力,从动机和技能方面为其日后在社会中的角色分配和扮演做准备,而各种角色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Mustafa,2012)。因此,如引言所述,对于这些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不仅需要运用相对剥夺感等经济领域的理论加以解释(梁枫、任荣明,2017),还应对影响参与者主观判断的因素予以研究,包括通过教育培养而成的核心价值观、规范意识及角色认知等。

选取“国民素质”作为中介因素,首先在于国民素质是可以体现个体核心价值观、规范意识及角色认知等的综合概念。国民素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素质由健康素质、智力素质、心理(人格)素质、道德素质、角色素质构成”(沙莲香,2000),也有学者认为“国民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社会文化素质,其中社会文化素质主要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能力素质四大要素”(单培勇,2002)。尤为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国民素质是国民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完整的国民素质应包含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的公民品格”(沙莲香、干春松,1995)。因此国民素质的概念必须蕴含着价值观、心理和道德方面的内容。其次,教育是影响国民素质的主要因素。根据国民素质的构成,学界多把国民素质分为两大层面:以身体素质为基础国民素质,和包含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分布在更高层次上的深层国民素质。国民素质遵循天赋资源与后天教育相统一的规律。身体素质是国民素质的物质基础,是开发天赋资源的前提条件。“但人由自在性向自为性的提升、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提升、由天赋素质向现实素质的转化,必须接受各方面的教育和培养,诸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单培勇,2011)。健康的心理、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法治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必须依靠后天教育。最后,国民素质因素如同经济因素一样,既可以从

宏观层面进行观察,也可以在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国民既是个体又是总体,国民素质是个体素质与总体素质的统一,从国民总体上,国民素质是各种素质的综合,而对个体的研究是国民素质研究的基础,因此,国民素质虽然是综合性的概念,但完全可以作为微观研究变量。长期以来,由于相较身体素质的指标,道德素质等指标具有客观性弱、难以定量描述等特点。关于我国国民素质,特别是论及价值观与道德等深层国民素质的实证研究不足,严重制约国民素质研究的应用性和政策性。因此,本研究尝试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能够达到在国民素质应用研究领域抛砖引玉的效果。

当前我国的社会研究依然离不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这两个大背景。人口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国国民素质中身体素质等基础国民素质的指标会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时,一种社会共识是,我国国民的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深层国民素质并非同经济发展相一致,特别是在社会变迁时,个体的价值观与道德取向会面临巨大的冲击,表现为个体在社会及利益冲突时的辨别水平、选择方向、适应能力以及自我规范等问题,损人利己、违背公德、破坏秩序等“素质低下”的社会现象经常发生。因此,本研究从维护社会稳定和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补充了有关教育的非市场收益的研究文献,也为政府部门关于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模型、数据和变量

(一)模型构建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采用的具体模型如下。

$$Ge = c_1 + \alpha_1 Edu + \sum_{i=2}^9 b_{i(1)} X_i + u \quad (1)$$

$$M = c_2 + \alpha_2 Edu + \sum_{i=2}^9 b_{i(2)} X_i + u \quad (2)$$

$$Ge = c_3 + \alpha_3 Edu + \beta M + \sum_{i=2}^9 b_{i(3)} X_i + u \quad (3)$$

其中,Ge为群体性事件(Group Event)因变量,Edu为教育自变量。M=National Quality为中介变量,表示国民素质。 $X_{i=2\sim 9}$ 为一系列表现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收入、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

根据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为了验证教育自变量Edu通过影响中介变量M,进而影响到群体性事件因变量Ge的中介效应是

否存在,需要进行以下几步检验:第一步,检验方程(1)的系数 α_1 是否显著;第二步:如果 α_1 显著,则依次分别检验 α_2 、 β 是否显著;第三步:如果 α_2 、 β 都显著,则检验 α_3 是否显著,否则做 Sobel 检验。在 α_2 、 β 都显著的情况下,如果 α_3 不显著,则是一种完全中介效应的情况,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完全通过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如果 α_3 显著,则是一种不完全的中介效应的情况,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是通过多个中介变量来实现的。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调研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全面地收集了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居民的微观数据,可以反映出样本的微观特征,这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

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一共有11783个样本。调研问卷的D部分涉及了群体性事件,问题D12a询问了受访者过去三年间在其身边是否发生过群体性事件,回答为“是”的受访者会被继续问及其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程度。对样本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发现,有1445名受访者表示近三年间身边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有10267名受访者身边未发生群体性事件,而有71名受访者拒绝回答。因此,身边未发生群体性事件,以及拒绝回答的受访者数量占到了全部样本的约87.74%。如果我们使用全部的样本来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那么未曾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的受访者占比将过大,回归结果可能将被这种类型的样本所支配,故回归结果很有可能将产生偏差。因此,后文将仅以1445名近三年间身边曾经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的受访者为样本做进一步的分析。

如前文所述,关于我国国民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等深层国民素质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用于描述与衡量国民素质的中介变量的选取,既是难点,也是创新点。最终,本文选取问题“D22. 请问您的下列行为的发生程度如何? 1. 遵守交通规则”,来衡量受访者的国民素质。理由在于:首先,在影响个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方面,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使受教育者认知和遵守社会规范,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往往公德和守法意识越强。因此,无论从探究教育非市场收益的角度,还是从重点研究道德、规范意识等深层国民素质的角度,遵守交通规则都是符合研究逻辑的统计变量。其次,社会中的策略性互动有三种基本的类型:冲突、协作(coordination)和合作(cooperation),冲突关系中,一方的获益唯有以另一方的损失为必要条件,协作的互动几乎与此相反,一方的获益必须以另一方的获益为必要条件,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一种典型的协作行为(哈丁,2013)。因此,选取遵守交通规则作为社会冲突研究的中介变量,理论上容易获得理想

的实证结果。最后,在已有文献中,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学校对学生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德教育,其中就包括运用遵守交通规则的事例教育学生为什么在群体领域要坚持群体利益优先的原则,积极推进他们向更高的道德发展阶段前进(傅维利、刘靖华,2017)。表1列举出了本文所使用的变量的名称、符号、对应的调研问题和定义。

表1 本文所有变量的名称、符号、对应的调研问题及定义

变量的名称	变量的符号	变量对应的调研 问卷题号及问题	变量的定义(赋值)
群体性事件 参与程度	Ge	D12c. 在这些活动或行动中,您是否担任过以下角色?	组织者=5;亲自参与活动=4;未参与活动,但提供了物质支持=3;未参与活动,但提供了道义支持=2;从未参与=1。
最高受教育程度	Edu	A7a. 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正在读的)	研究生及以上=9;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8;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7;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6;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5;技校、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4;初中=3;小学、私塾=2;没有受过任何教育=1。
国民素质	National Quality	D22. 请问您的下列行为的发生程度如何? 1. 遵守交通规则	总是=5;经常=4;有时=3;很少=2;从未=1。
性别	Gender	A2. 性别	男=1;女=0。
年龄	Age	A3. 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	以2010减去受访者的出生年份来计算。
民族	Nation	A4. 您的民族是	汉族=1;其他民族=0。
宗教信仰	Religion	A5. 您的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1;无宗教信仰=0。
收入	Income	A8a. 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以万元为单位
政治面貌	Politics	A10. 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	中共党员=1;其他=0。

续表

变量的名称	变量的符号	变量对应的调研 问卷题号及问题	变量的定义(赋值)
健康状况	Health	A15.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	很健康=5; 比较健康=4; 一般=3; 比较不健康=2; 很不健康=1。
婚姻状况	Marriage	A69. 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	已婚、同居=1; 其他=0。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为了使本文的实证研究更具有准确性,本文删除了受访者拒绝回答、回答为不知道、回答缺失的样本。在去除这些样本后,最终一共获得 1263 个样本。

从样本的基本分布来看,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其中,男性样本占比 54.55%,女性样本占比 45.45%;汉族样本占比 95.09%,少数民族样本占比 4.91%;有宗教信仰的样本占比 12.98%,没有宗教信仰的样本占比 87.02%;党员样本占比 17.58%,非党员样本占比 82.42%;已婚和同居的样本占比 81.95%,未婚的样本占比 18.05%。其他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列在了表 2 中。

表 2 部分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变量	Ge	Edu	National Quality	Age	Income	Health
平均值	1.64	3.88	4.56	43.39	2.71	3.68
标准差	1.18	1.88	0.62	14.32	8.92	1.06

根据表 2 的结果,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变量的均值为 1.64,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未参与过群体性事件。事实上,样本中 928 名受访者未参与过群体性事件,占比为 73.48%。而有 15 名受访者曾经组织了群体性事件,211 名受访者曾经亲自参与过群体性事件,还有 10 名、99 名受访者分别为群体性事件提供过物质支持和道义支持。尽管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情况总体向好,但是仍然有 26.52%的受访者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过群体性事件。因此,研究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的影响机制,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

另外, 本文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43.39 岁, 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为 3.88, 即绝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完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样本遵守交通规则的平均值为 4.56, 这表明大部分的受访者都基本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国民素质较高。另外, 样本上一年度的平均收入为 2.71 万元, 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为 3.68, 即比较健康的状态。

(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 3 列出了基本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行标出了对应的回归模型编号。所使用的回归方法是 OLS 最小二乘法。从模型的 F 值和 p 值来看, 模型整体是显著的。

表 3 基本回归结果

对应的回归方程	(1)	(2)	(3)
变量	Ge	National Quality	Ge
Edu	-0.1025*** [0.0207]	0.0235** [0.0110]	-0.0991*** [0.0207]
Gender	0.1405** [0.0673]	-0.0665* [0.0358]	0.1310** [0.0673]
Age	-0.0010 [0.0027]	0.0033** [0.0014]	-0.0006 [0.0027]
Nation	-0.1879 [0.1562]	0.1396* [0.0830]	-0.1681 [0.1560]
Religion	-0.0614 [0.1014]	-0.0187 [0.0539]	-0.0641 [0.1012]
Income	-0.0018 [0.0038]	0.0024 [0.0020]	-0.0015 [0.0038]
Politics	-0.0496 [0.0961]	0.0121 [0.0511]	-0.0479 [0.0959]
Health	-0.0853** [0.0333]	0.0556*** [0.0177]	-0.0774** [0.0334]
Marriage	0.1390 [0.0865]	0.1756*** [0.0459]	0.1641** [0.0868]
National Quality			-0.1427*** [0.0530]

续表

对应的回归方程	(1)	(2)	(3)
变量	Ge	National Quality	Ge
Constant	2.4086*** [0.2702]	3.8705*** [0.1435]	2.9609*** [0.3387]
F 值	6.25	4.82	6.38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R-squared	0.0429	0.0334	0.0484

注：中括号中列出了标准差。***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

本文将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赋值为 1—5，即赋值越高，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越深。根据回归模型(1)的结果，教育对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为负，并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教育水平提升一个层级，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会下降大约 10.25%。并且，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的结果为：系数 α_1 显著，可以继续做第二步的检验。

根据回归模型(2)的结果，教育水平对受访者国民素质的影响为正，教育水平提升一个层级，受访者的国民素质指标会提升大约 2.35%，并且系数在 5% 的水平下显著。因此，教育对 $M = \text{National Quality}$ 这个变量有显著的影响，即 α_2 显著。

根据回归模型(3)的结果，当在回归模型(1)中加入变量 M 后，受访者的国民素质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的影响为负。变量 M 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受访者的国民素质指标提升一个层级，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会下降大约 14.27%。

继续分析模型(3)中教育变量的显著性。回归结果显示，此时教育变量的系数为负，并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教育通过提升受访者的国民素质，进而降低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的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并且是一种不完全的中介效应。

(三) 稳健性检验

前文将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 1—5，这种赋值模式可以区分出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高低，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接下来将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仅做 0 和 1 的赋值，即从未参与赋值为 0，其他各种形式的参与群体性事件均赋值为 1。这种赋值模式仅对受访者是否参与群体性事件进行区分，虽然会人为地减少一部分的信息量，但是也

避免了对参与程度高低赋值的主观性。在这样的赋值模式下,对回归模型(1)和(3)做回归时需要采用 Probit 模型。表 4 列出了部分关键变量的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模型整体依然具有显著性。如果模型的预测值 Ge 大于或等于 0.5,则认为其预测 $Ge=1$,反之认为其预测 $Ge=0$,将预测值与样本实际值进行比较,就可以计算正确预测的比率,模型的正确预测比率都在 73.60%左右。

表 4 稳健性检验

对应的回归方程 变量	(1) Ge	(3) Ge
Edu	-0.0866*** [0.0251]	-0.0826*** [0.0251]
National Quality		-0.1771*** [0.0606]
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40.36	48.90
p 值	0.0000	0.0000
正确预测的比率	73.54%	73.62%

注:中括号中列出了标准差。***表示 $p < 0.01$ 。

模型(1)教育变量对受访者是否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依然为负,教育水平提高一个层级,受访者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下降大约 8.30% [$\exp(-0.0866) - 1$],并且在 1%的水平下显著。而加入变量 M 之后,变量 M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变量 M 的中介效应显著,又由于回归模型(3)中教育变量的系数也显著,所以是一种不完全的中介效应。

因此,本文所获得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受访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同时,国民素质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即教育可以通过提升受访者的国民素质来降低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程度。

五、结论

长期以来,针对教育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的功能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微观层面上,主要关注教育对个体“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回报。而本文从微观层面探究了教育对社会冲突的影响。

本文使用 CGSS 的调研数据,证实了我国教育可以降低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和程度。同时,研究还发现,国民素质是教育影响社会冲突的中

介变量之一。这说明教育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首先在于,政府在制定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时,不应只考虑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性与工具性,而应更多地关注深层次的影响我国社会秩序的问题,如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民素质的问题。与之对应的,政府在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的工作中,应该更多地发挥教育所具有的提升国民素质的功能,即通过发展教育使社会维持稳定。其次,提升国民素质应成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不仅要让国民具有强健的体格,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更要让国民拥有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规范意识等,在提升国民素质的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在指标的选取上,选用遵守交通规则来衡量国民素质,指标较为单一,而受访者遵守交通规则的程度是由受访者自己描述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二,在数据的选取上,CGSS数据库的数据是一种截面数据,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追踪数据。

[参考文献]

- 傅维利、刘靖华,2017:《公德困境形成的机理及其对学校公德教育的启示》,《教育科学》第1期。
- 郭星华,2009:《“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新解》,《人民论坛》第16期。
- 哈丁,2013:《群体冲突的逻辑》,刘春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金桥,2012:《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拉尔夫·达伦多夫,2016:《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汉林、魏钦恭、张彦,2010:《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李林、田禾,2014:《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梁枫、任荣明,2017:《基于利益相关和相对剥夺感的群体性事件动机城乡对比》,《经济与管理研究》第1期。
- 沙莲香,2000:《论中国人的素质构成与社会发展》,《教学与研究》第7期。
- 沙莲香、干春松,1995:《国民素质的结构分析》,《开放时代》第3期。
- 单培勇,2002:《对国民素质结构与分类的再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单培勇,2011:《略论国民素质发展规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王战军,2006:《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政法学刊》第5期。
-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第5期。

- 于建嵘, 2015:《沉默抑或暴力:警惕民众政治心态的两极化》,《探索与争鸣》第11期。
- 赵鼎新, 2011:《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Mustafa, S., 2012, “A Critical Look at the Theories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Sciences*, 9(1): 651—671.
- Parsons, T., 1961, *Theories of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Education, National Quality and Social Conflict

LIANG Feng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modern social system has mainly focused on economic field. At a micro level,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return of education to individuals. In fact, education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both economy and society.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social conflicts from micro level has great value. The study on education’s mediating effect on social conflict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economic factor, but also on non-economic factor such as national qual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xplain the reason of social conflicts represented by group event more comprehensively.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the data of CGS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degree of interviewees’ participation in group event will be reduced with the raise of education level. At the same time, education has impact on social conflicts and national quality is one of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This shows that educa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bove-mentioned research has two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ly, when formulating policie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strategic and instrumental nature of group event,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eper problems affecting China’s social order, such as core values of society and national quality. Correspondingly, in the work of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education’s function on improving national quality. That is to s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econdly, improving national quality should be one of the main objectives of government’s work. Chinese people should not only have strong physique, master rich cultural knowledg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should have right values, noble morality and good consciousness of norm.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care for this but lose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national quality.

Key words: education; national quality; social conflict; group event

(责任编辑:孟大虎 责任校对:孟大虎 胡咏梅)